

记宋代发现的早商青铜大方鼎

马立志

商代早期青铜铸造业在二里头文化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为殷墟青铜器走向高峰奠定了基础。青铜大方鼎是早商青铜铸造业的代表作,它们以形体硕大、深斗形腹、腹部偏上装饰横带状兽面纹、底边与两侧底环以U形乳钉纹带、柱形蹄足等为特征。1974年以来,在郑州的张寨南街、向阳食品厂、南顺城街三处窖藏陆续出土了8件大方鼎。形制非凡的大方鼎是商王室活动的见证,成为郑州南都地位的标识。在山西平陆坡底村前庄遗址、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也各出土过1件大方鼎。这些发现为考察以往出现的大方鼎提供了依据。

在郑州方鼎发现之前,人们不能辨识早商方鼎,事实上,类似的方鼎在北宋《博古图录》中已经著录过。该书载有两件方鼎:“前一器,高二尺二寸,耳高五寸八分、阔六寸,深一尺二寸六分;口径长一尺七寸、阔一尺二寸,容一石九斗一升,重八十六斤七两。四足,无铭。后一器,高二尺一寸六分,耳高六寸一分,阔七寸,深一尺一寸七分,口径长一尺六寸三分、阔一尺三寸六分,容一石七斗,重一百斤。四足,无铭。右二器,方之诸鼎,特为高大。所同者,周以乳形,纯缘之下环以饗餐。所不同者,前一器乃夔足,而肩作蛇虺蟠足之状。后一器足亦作夔形,而鼻稜四翼屹起,然款足与体俱侧,恐致水火之齐,欲其易熟尔。但形制质朴,为众鼎之雄,实可宝于后世者。”

同时代的黄伯思《东观余论》也记录了“周方鼎”,“今此二器,制度与诸方鼎同,盖周器也,故曰以‘周方鼎’。其大也几可以画牺牛之全体,其文鏤也淳美而不华,其中也略无雕刻……此鼎腹之四周皆饰以乳,其数比他器为多,盖示推己以养亲之义……此鼎形特大而乳极多……鼎之四足皆衔以羊体……鼎之唇缘,其文鏤也,合则为饗餐,以著贪暴之戒……至于足之中空上彻于底而无碍,则以敛内油之淫浊,兼取其易任耳……”

黄氏曾参与考订北宋内府所藏书画法帖、金石古器等,他的不少意见被采入《博古》书中。《东观余论》是由其子辑成的,书中记录的两件方鼎的信息与《博古》一致。

《博古》收录的铜器,至靖康之变,大部分被金人掳携北上,“然其十之一二,尚见于张抡《绍兴内府古器评》。”其书云“周乳纹鼎二。二器形模制作皆无少异,通体不加雕镂,惟饰以乳而已。”张书不摹器形、款识,只是考释铭文。透过张抡的记载,仍可推定,他所平述的对象正是《博古》方鼎。此后,两鼎便罕见于记载。

《博古》两鼎形制都是长方形器口,外折平沿,两侧圆拱形竖耳,耳外壁作凹槽状(槽内有两至三道凸棱)。腹部呈上宽下窄的长方斗形,口沿下饰一周横带兽面纹,腹部两侧边及底边饰以U形乳钉纹带。上粗下细的蹄足,上端装饰兽面,下部饰数道凸弦纹,蹄足内部中空,直接连通器腹内底(“款足与体俱彻”“足之中空上彻于底”)。这些特征均见于郑州等地出土的大方鼎。

我们按照宋代度量衡的量值,把两件方鼎的尺度折算成今值,与考古出土的方鼎尺寸、重量进行比较(表1,表中省略了年代明显偏早的南顺城街H1上:3、4,2鼎)。

相形之下,《博古》两鼎体量接近,高度尺寸不及出土诸鼎(不排除有换算标准、铜器或有泥沁等原因导致的误差),若单论重量却可以排在已发现的早商方鼎前列,说明两鼎的器壁要更厚一些。器壁增厚是早商方鼎向殷墟大方鼎发展的趋势。

《博古》方鼎与郑州等地的方鼎相比,有不尽相同的地方。如兽面的鼻梁较郑州方鼎为宽且凸起(“鼻梁四翼屹起”),蹄足有勾戟扉棱,也不见于郑州、平陆的方鼎。

两件方鼎之间也有细节差异。方鼎一腹部正中是细阳线兽面纹,因采用双钩描绘,可知其线条较粗,鼻梁左右两侧及口沿下四隅仅装饰凸起的圆目,以回纹为底纹,蹄形足,下端有两道弦纹,足根饰以浮雕羊首兽面。方鼎二腹部正中,腹侧是宽线兽面纹,无底纹,蹄形足,下端有四道弦纹,足根饰以C形角兽面。这些特征帮助我们推断《博古》方鼎的序列位置。

《博古》等书将方鼎视为周器是不足凭信的。这类大方鼎属于杨宝成等先生论述中的Aa型大方鼎(《考古》1991年6期),它出现于二里岗期,流行于殷墟期。

该型大方鼎的演变趋势是:最初为上粗下细、内部中空的柱足,足下端鼓凸如兽蹄,写实性较强,足上饰以横带状兽面纹,下端有几道凸起的弦纹,其例以郑州方鼎为早。后续的方鼎变得器壁厚重,鼎足是粗壮的柱足,上下粗细较为均一,蹄足意味消退,足根装饰浮雕兽面,兽面中间有宽厚的扉棱。西北岗王陵HPK1004兕鼎及鹿鼎、妣(司母)戊鼎、小屯M5:789及809癸辛鼎皆属此类。时代再晚一些,此类方鼎变得小巧庄重,进入小方鼎的序列,足部呈上下粗细均一的细高柱足,这种小方鼎流行于殷墟后期和西周早期。

顺便提到,殷墟四期有一类成对的小方鼎,其例有:国家博物馆藏小子父己方鼎和圣路易艺术博物馆藏小子作父己方鼎;安阳小屯工作站院内82M1:46虎饗父方鼎(1件);安阳刘家庄M1046:16,17方鼎;安阳郭家寨1987M1:19,20方鼎;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和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分



1. 新干大洋洲XDM:8乳丁纹虎耳方鼎
2、3、4. 大洋洲XDM:8方鼎鼎耳、足根羊角兽面纹、腹部纹饰
5、6.《博古图录》方鼎二兽面纹双钩、填实

新干大洋洲XDM:8方鼎与《博古图录》方鼎二纹饰之比较

别所藏再癸方鼎等。以往或有学者把最后一例的年代归属于中商,乍看之下,这种方鼎的乳钉纹、带状兽面纹或细阳线云纹、连珠纹酷似早商风格,唯其器体矮小厚重,实心柱足细长,与早商方鼎不同。我们认为,殷墟四期的小方鼎属于“复古”作品,前举例第一、第二小方鼎,就是以早商的方鼎为蓝本的。

郑州三处铜器窖藏的埋藏时间是二里岗上层二期,但8件青铜方鼎铸造的年代有相对的早晚,学者对它们进行了分组:最早的一组包括南顺城街H1上:2、3、4三件,形制纹饰素朴原始;稍后一组包括向阳食品厂H1:2、8两件及南顺城街H1上:1鼎;最晚一组包括张寨南街杜岭1号、2号鼎。

如果按照四足的装饰进行区分,郑州商城的8件方鼎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是正、倒三角形几何纹,包括前述第一组的3件鼎;第二种是柱足上半部光素,有向阳H1:2;第三种是柱足中段饰横带状细阳线鱼尾形兽面,包括向阳H1:8和杜岭的两件;第四种是C形角兽面,自足根开始施陈至柱足下部,包括南顺城街H1上:1。

《博古》方鼎二的足根装饰C形角兽面纹,与郑州较晚的南顺城街H1上:1鼎足兽面一致。其他足根为C形角兽面纹的例子,见于平陆前庄大圆鼎,济南大辛庄M139:1大圆鼎,喀左小波汰沟兽面纹大圆鼎,连云港大村大圆鼎等。后3例鼎足的兽面是扉棱状鼻梁,浮雕C形角形状,已接近殷墟一期的小屯M5:808亚弓鼎鼎足。

方鼎一的足根兽面纹,《东观余论》形容为“四足皆衔以羊体”,从摹绘的图像来看,是浮雕形羊角兽面。《博古》描摹纹饰精细,这种羊角兽面在考古中的确切实例,是新干大洋洲XDM:8方鼎鼎足。若把方鼎一腹部正中的双勾兽面填实,再与新干方鼎的兽面比较,二者的相似性就更明显了。

《博古》两鼎足部均有带棱的,这一特征尚未出现在郑州、平陆方鼎上。时代接近的足部有扉棱的鼎,除了前举小波汰、大辛庄、大村等例之外,还有安阳三家村窖藏G1:7圆鼎。其他时代接近带有扉棱的铜器,可举郑州人民公园圆尊、灵宝东桥圆尊、北京平谷刘家河羊首壺,襄城台西采集C:4鼎,陕西礼泉朱马嘴鼎、甗等为列。

大洋洲墓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半数以上的青铜礼器带有勾戟扉棱。这批铜器的年代主体属于中商时期,也就是介于二里岗上层和殷墟一期晚段之间。孙华指出,新干虎耳大方鼎正介于向阳H1方鼎和殷墟小辛鼎之间。

在目前的研究中,以上列举的比较材料是二里岗上层二期至殷墟一期的典型例子,这一区间相当于邹衡先生商文化分期的早商第Ⅵ、Ⅶ、Ⅷ组,在一些学者那里是以“中商”概念出现的。因此,《博古》两件方鼎的序列位置是较为清楚的——它接续郑州最晚的方鼎,是二里岗上层二期与殷墟一期之间的铜器。

两件方鼎都是早商之末的作品,它们是否为同一时地出土?二者的制造背景是怎样的?

方鼎一的浮雕羊首、带有勾戟扉棱的柱足,与大洋洲方鼎极其近似,可能与后者存在联系,或受到大洋洲所属吴城文化的影响。方鼎二的诸多特征已见于郑州最晚的方鼎南顺城街H1上:1,只是较后者多出足根的扉棱,器足是中商流行的C形角兽面纹。这说明方鼎二处在郑州与殷墟之间的传统序列中,其制造者当与郑州商城或安阳殷都存在联系。

早商大方鼎的出土地点已如前述。殷墟大方鼎出自商王、王后之墓;西北岗HPK1004出土兕鼎、鹿鼎纹饰与铭文呼应,是商王田猎活动之后“铭功旋纪”的记事作品,堪与同类兽骨记事刻辞合观;妣戊鼎、妣辛鼎分别是祭祀武丁配偶妇姁、妇好之器。大洋洲铜器的主人属于吴城文化的最高统治者。

郑州三处窖藏皆位于商城内城墙之外的岗阜上,出于有目的的瘞埋。窖藏的原因,或认为属于室内部动乱导致的埋藏,或认为属于祭祀仪式的遗物,后一说所举“祭祀瘞埋”的依据较为可信,只是对祭祀对象仍有不同看法。出土1件大方鼎和2件大圆鼎的前庄遗址,位于石膏河汇入黄河处,崖岸脚下濒临黄河,同期临近地点有东夏冯商城、垣曲商城两个区域中心,前庄铜器可能属于商代贵族祭祀祀山活动的窖藏。

总之,《博古》大方鼎当是出自两处早商末(或“中商”)等级很高的遗址。将来如能发现有关两鼎出土地点的史料,对于考古工作是有启示的。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

观点

浅议何家村窖藏银制蒸馏器具医药内涵

李沛憶

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有唐代银瓶罐及相关炼丹器具,具有值得关注的医药内涵。本文从蒸馏器具的功用指向、医疗实践及传统医药文化等方向探论,延伸古代蒸馏工艺与传统医药发展的关联,并揭示其医药内涵和对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影响。

银制蒸馏器的医药功用

该窖藏出土的两款银罐,应与唐代炼丹活动密切相关,是炼丹专用蒸馏器具,以其中的银制石榴罐为代表。银石榴罐共4个,形制基本相同,小口,平底,均有盖,器体厚重。罐口插有用以封口的塞柱,使其内容物无论是液体还是粉末都不易泄流散发。罐底残留有加热痕迹。该器具与南宋时的《金华子碧丹经秘旨》中石榴罐升炼器的示意图相似。技法上,石榴罐升炼器实质上与未济炉功用相同。即该罐的制法是一种向下蒸馏法。此外,同窖藏中发现有仰莲瓣座银罐,底部有孔,孔径与银石榴瓶瓶口相近,且有一周黄色的残存物,可能和《铅汞甲庚至宝集成》所记载丹合子功用相似。文献述将丹合子及水罐放置于匱中,四周被火包围,合子中的丹砂低温加热后生成水银,经丹合底部石砖的孔滴入下部的水罐中,被水冷却后成为液态水银。由此推测仰莲瓣座银罐或为炼丹反应器,与银石榴罐同属丹药加工器具。

两件银质器具造型精巧,纹样精致。结合窖藏同出药物遗存分析,其与唐代统治者迷信道教服饵仙术,大力支持道士们炼丹活动的历史背景可谓契合,或证明道教外丹术在唐代得到空前的发展,服食外丹成为皇廷贵族盛行之风。葛洪《抱朴子内篇》指出,服食金丹是成仙的最主要途径,认为以行气、断谷、服食草木药物的一种方法修仙,效果只是获得长寿而已,而炼制金丹才是成仙的正途,所谓“小丹之下者,犹自远胜草木之上者也”。这种执着,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我国古代成熟的蒸馏制取工艺。从以上可以看出道家的炼丹术应是推动了中国古代蒸馏技术的发展。同时,对比唐代医药文献可知,该时期丹药不再单一作为修仙之物,其已具有成熟的医疗功用。如唐代医家孙思邈著《太平经要诀》部分丹方有配伍草木药物,《备急千金要方》载有一种内服治疗疫病的“太一神精丹”。蒸馏器具已成为药物认知范式跃迁的物质载

学术动态

虢国和两周封国考古与历史文化研讨会纪要

三门峡市仰韶文化研究中心

8月9日,虢国和两周封国考古与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河南三门峡举行。本次会议聚焦虢国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两周封国考古新发现与研究、虢国和两周封国社会和历史文化变迁、两周封国都城研究、两周文化变迁和社会演进与中华文明发展研究等多个议题,共收集论文94篇。

主旨发言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中心主任刘源从氏名与名字、婚媾、职官、右者、征伐等五个方面阐释了周金文虢氏资料的史学价值。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新斌梳理了先秦时期苏国地望、主要事迹、对苏、虢关系进行了探讨。厦门大学教授张闻捷根据编钟时代特点和发展规律,排列出M2001饒季墓、M2011太子墓、M2009饒仲墓和M1052太子墓的年代顺序,认为整个墓地的布局遵循由西向东进而折向西南的规律。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官希成介绍了武王墩考古在墓室结构、出土器物、楚国王陵制度等方面取得的新认识,以及武王墩文物保护、展示等规划情况。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周宏伟结合文献史料和金文,分析了“宗周”“成周”的称呼对象,认为岐邑可称宗周、成周、丰邑、郕邑、槐里可称宗周,洛邑可称宗周、成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魏兴涛梳理了历年来虢国都城李家窑遗址发现的铸铜、制骨和制陶作坊以及仓储设施等重要遗存。尤其是2000年以来,城壕、环壕、宫城及夯土建筑等的发现,进一步论证了虢都上阳城的位置。三门峡市仰韶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杨海青介绍了三门峡地区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虢国墓地及虢国都城考古发现情况,梳理了虢国研究发展历程、成果。

虢国科技考古成果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周立刚对虢国先民和动物遗存进行的生物科技考古研究表明,其生活方式相对稳定,食物来源以粟黍为主。三门峡市仰韶文化研究中心馆员燕飞通过对义马市上石河墓地13例古代个体全基因组测序,揭示了虢国人群的遗传结构和人群互动特征。上石河人群表现出较高的母系和父系遗传多样性,其核心遗传来源可追溯至黄河流域相关群体。北京科技大学博士袁柯对李家窑遗址出土陶范的材质与烧制温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工具范和容器范的粘土含量和粒径分布存在明显差异。与同时期的荣阳官庄遗址出土陶范对比,容器范材质与工艺类似,而工具范差异明显,显示了两周之际青铜工艺转变期陶范工艺存在多元化发展的特征。

虢国考古研究 郑州大学教授邵向平对李家窑遗址墓葬研究认为,其与虢国墓地墓葬在随葬品和葬俗上比较接近,但在等级、墓葬方向、有无腰坑、壁龛等方面有明显差异。李家窑墓葬属于“居葬合一”,而虢国墓地则较为单纯。李家窑墓主可能以手工业者居多,不少应是殷遗民。河南大学教授张立东认为,虢始封于先周时期,存续约400年,形成西虢、东虢、大虢、小虢等政体。西虢初封于周原附近,为文王

体,具有炼丹史与医学史的宝贵意义。以往关于中国古代蒸馏器具的研究多集中于蒸馏制酒的研究方向,而考古实物提醒我们,其医药功能指向的探论不应被忽视。

蒸馏制取丹药背后的医疗实践

观何家村出土的蒸馏器具材质,应属于上层权贵享有,体现当时对修仙长生的重视,也侧面反映出外丹养生的医疗实践。《道藏》第19册记载:“水银欬金铜锡毒,化还复为丹,久服神仙不死。”白银性本有毒,不能直接服食,但作为炼丹器具与朱砂、水银药物相互作用,药石则可沾染上银之气,化解毒性,从而达到阴阳和合之道。同时,医药著作中注明服食丹药的禁忌,从而保持效果,维护机体平衡。此与炼丹蒸馏器的水银(汞)伏制法相呼应。作为丹方的原料,水银需经草木金石药伏制“去毒”后方可入药。“伏制”法即可以通过增加植物药来克制金石药的火热毒性,也可以通过燃烧或与地相接等方法减火去性,说明经实践,该时期对丹药毒性的认识相较成熟,懂得通过医药手段化解金石丹药的毒副作用。

炼丹蒸馏器具是古代药学从经验走向实验的关键物质中介。它能深层推动药性认知从整体医药向活性成分的范式转移,并折射出技术实践与自然哲学思想的深刻互构。汉代虽存在蒸馏提取技术,但医疗指向不明。如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制蒸馏器,印证汉代对蒸馏、冷凝已有了充分的认识和积累,并形成一定的蒸馏技术,但缺乏医药实践。且这种工艺技术主供于上层社会,一般人无法接触,未得到普及延续。何家村窖藏的唐代银石榴蒸馏器及相关炼丹器具,则呈现出明确的医疗实践,是反映“升炼”炼丹思想的技术呈现。透过出土器具,可知这种炼丹的蒸馏过程应是呼应了传统医学“升清降浊”与道家炼丹术“升华提纯”的哲学理念,可被视为模拟自然精粹生成的人工“升炼”。炼丹蒸馏器的出土,更加印证蒸馏制取过程“仿云雨之升降”,合传统医学“阴阳象大论”养生哲理,是道医同途思想的最好佐证。

蒸馏炼丹的医药学文化张力

通过何家村窖藏出土银石榴罐等炼丹器

具实物,可窥见这种蒸馏工艺所释放的重要医药文化价值。炼丹术从产生便与医药学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晋书》言靳邵:“不知何许人,性明敏,有才术。本草、经方,诵览通究,裁方治疗,意出众表。创制五石散方,晋朝士大夫无不服饵,皆获异效。”《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齐王侍医遂病,自炼五石服之。”对比文献,可知金石用于治病疗疾也当在其用于“金丹”炼制之前,且炉火烧炼的方式似乎并非外丹家所独创,应有对中医药学的借鉴学习。中医药背景下,丹药的医药属性逐渐突显。蒸馏器具承载着人们修仙长生的梦,又反映了药物提纯意识的发展。银石榴罐蒸馏器具承载的,已经不是单一上层社会对于修仙长生的执念,更有社会对传统医药养生的探索。传统医药发展下,医家对矿物药毒性的认识不断更新,对丹药文化的把握也趋于理性。

同时,传统炼丹术西传,促成了海外炼金术的发展和蒸馏提香思想的传播。如李约瑟相关著作中提及,中国的炼丹术在唐代对外交流中传入阿拉伯,经阿拉伯传向西欧,并催生出阿拉伯蒸馏提香工艺。唐代舶来香药的社会应用和需求正向递增,使得阿拉伯蔷薇露及蒸馏提香技术传入唐域。外来商人将蒸馏花草制取的香露售卖至唐,受到唐人喜爱,推动了该时期香药文化的新发展。蔡绛《铁围山丛谈》也言蔷薇水“实用白金为甑,采蔷薇花蒸气成水,则屡采屡蒸,积而为香,此所以不败。但异域蔷薇花气,馨烈非常,故大食国蔷薇水虽贮琉璃瓶中,蜡密封其外,然香犹透也。闻数十步,洒著人衣袂,经数十日不散也。”说明这种特殊香品及附带的蒸馏提香意识已被初步引入。这种蒸馏技术获得新关注,虽然传播初期未能将这种提取工艺广泛延续发展,但人们对香药的喜悦,使得这种意识逐步存蓄,最终在明代西方药露的传播影响下,该“露剂”剂型彻底纳入本土医药体系。

中外文化交流下,古代蒸馏工艺辗转更新。从金丹到药露,其医药属性业已凸显。出土蒸馏器具与文献相互验证,明确传统医药文化对道家炼丹术的容纳之力与消化之功。同时,蒸馏炼丹器一方面承载着人们的神圣信仰,另一方面又是早期药物制备的实用工具,这种虚幻又实用的矛盾统一,在不同文化交互下又迸发出新的意义。

(作者单位:陕西中医药大学)

三门峡市仰韶文化研究中心

弟叔叙封地;东虢位于河南荥阳,为虢仲封国,两周之际被郑所灭。三门峡之“大虢”是由西虢在两周之际东迁,公元前655年为晋所灭。小虢为西虢留居故地的支庶,春秋初为秦所灭。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陈英杰比较秦公簋和饒季子白盘文字体势,对饒季子白盘的年代进行了探讨。吉林大学博士刘勇江检讨了饒季子白盘年代携王说,认为虢盘非携王十二年器,北白鸛墓地新出资料尚不能作为否定虢盘宣王十二年说的绝对证据。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研究员李清丽认为虢国墓地M2001墓主“饒季”是春秋早期重获卿士职位的虢公忌父,M2009墓主“饒仲”是“立王子余臣于槐”的虢公翰。上海大学博士张玉行认为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9墓主饒仲与饒季子白为一,即虢公翰,三门峡虢国墓地当为饒季氏的家族墓地。南开大学博士臧志峪认为虢国墓地M2009墓主饒仲为虢公翰,M2001墓主饒季为虢公忌父。与M2009异穴合葬的饒姜墓略晚于饒仲婚姻,为饒仲后裔之妻。饒仲元配为饒鼓。饒仲婚姻对象的前后变化反映出春秋初期周王室试图用婚姻牵制重要诸侯国、重建自身地位。周口师范学院副教授李治中结合公臣簋、柞伯鼎、散盘等器铭,认为饒仲应于厉王三十三年十月之后封虢国;结合扶风强家村出土的师丕家族器,认为饒仲属于师丕家族,饒仲与师望为兄弟,生活年代上可至懿、孝王时期;饒仲、饒季、饒宣公子白为相继的虢国国君,子白主要生活在厉王时期。上海大学教授宁镇强对饒季子白盘铭文的“先行”和“王嘉子白义”的“义”重新解读,认为“先行”指军功,“义”指“德”。潍坊市博物馆研究员孙敬明对饒太子佚之与车斧铭文进行了讨论。郑州轻工业大学胡媛媛对三门峡虢国墓出土的人形玉器进行了研究,认为复合型人形玉器数量最多,以璜、璋礼器最具地域特色,不仅具有神灵的功能,更是当时宗法礼仪的物化载体。三门峡市仰韶文化研究中心助理馆员胡轍对虢国墓地出土的背鸟蚕身龙形玉佩进行了分析。

两周封国考古新发现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王煜凡分享了陕西富平长春西周遗址的发掘收获与认识。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张鹏介绍了邯郸百家村、彭家寨墓群战国墓葬新发现,对邯郸赵墓的空间分布、丧葬制度、文化特征等有了新认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董文斌介绍了2023年至2024年山东高青陈庄遗址发掘收获。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周青以新近发现的湖北沙洋新村墓地M1完整揭露的一处战国时期南方楚地墓上夯土遗迹为线索,探讨了“墓祭”“寝祭”及其与先秦墓上建筑的关系等礼俗问题。韩城市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馆员方琦介绍了以梁带村芮国墓地为中心开展的田野调查工作,根据韩城梁带村、澄城刘家洼芮国遗址出土文物以及相关文献推测芮国在梁带村存在150年左右。

两周封国考古研究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文胜通过分析西周时期晋南地区诸侯国墓葬的考古资料,探讨了周文化与制度在该地区逐渐成为主流,各诸侯国墓葬制度趋于统一的过程。山东大学副研究员刘艳菲对鲁国棺槨装饰进行了研究,认为可分为甲组墓和乙组墓,鲁国与齐国、山东其他夷人国家的棺槨装饰时期有差别。南昌大学副教授周博通过战国时期的鄂君启车节铭文所载车行路线,结合西周金文材料、传世文献等,探讨了西周汝水通道。山东大学博士李凤翔从武王墩入手,探讨了如何辨识楚国棺槨等问题。

两周封国文化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段爱玲对东周郑国地缘政治活动进行了探讨,认为郑国历史可概括为“采邑—迁国—扩张—四战—衰亡”五阶段,东周郑国处于后四个阶段。武汉大学教授郑威分析了以汝颍流域和随枣走廊为区域中心的周代南土、楚人北疆的动态变化过程。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马保春重新审视了燕国始封地的地望,认为从金文等文献看应为“偃山”“偃水”,燕国国都北迁前城后,对应的燕山可能一起北移至蓟城以北的山地。华东政法大學研究员王沛从霸姬诸器铭文中涉及的两起诉讼案件出发,探讨了西周时期礼法结合问题,认为礼法结合在早期国家政权建构、夷夏交融及统一秩序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农业博物馆助理研究员徐晓美慧通过金文“宗彝一肆”到“扬钟一肆”的变化,认为“宗彝”作为青铜器共名,不同时期其所指有显著差异,核心礼制用器和沟通人神方式的转变,反映出西周存在两次礼制变革。(执笔:王龙霄 祝晓东)